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这些年里,任秀波尽了本分,他经历的极限不算少。

一次在藏北无人区，暴风雪夜里,车坏了,他和老队员一起,30 多个小时没吃东西,在冰原上走了 40 多公里，成功求生,不但又回去救出了队友,还完成了重力测量任务；

还有一次在西藏阿里，在海拔 5000 多米的甜水海测量点,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任秀波虚脱了,呕吐了两天,胃里的东西吐完之后,居然开始吐血。为了不影响作业进度,他硬是挺到 48 小时联测结束之后,才下撤到新疆叶城。

以往每一次面对极限,年轻的任秀波总有强大的信心，他相信自己能扛过去,就像那些经历过同样极限的老队员一样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,因为没有老队员经历过。就是在全世界,也没有专业测绘人员,到过如此高的海拔高度。

云朵在脚下飘动,不远处的珠峰峰顶雪白而圣洁。离天如此之近,脚下依然是祖国的大地。任秀波仰望苍天,双脚发力,可背上的仪器却重逾千斤。

在海拔 6500 米以上,任秀波已经待了 40 多天,他的脸已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,成了棕褐色,有多处开裂;他的身体极度消耗,严重营养不良,体重下降了 20 多斤。

这么多天的适应、等待和忍耐,就是为了把测量线伸到祖国大地的顶端,延伸到世界之巅。

重新精确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,是中国测绘人的梦想。极度虚弱的任秀波不甘心,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到下一个宿营地,但是他要试一试,拼死也要下一试。

面对极限,任秀波超越了自己。在极度缺氧和暴风雪中,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 7790 米的 2 号登山营地。

当他他们登山队员因为极度疲劳都躺在帐篷里休息时，任秀波待在帐篷外,冒着暴风雪,喘着粗气,在没有任何供氧设备的情况下,架起重力仪,测出重力值,并用 GPS 接收机测量了该点的三维坐标。

从此,共和国测绘史上诞生了新的高度——7790 米。这也是世界测绘史上新的高度。

几天后，记者在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任秀波。他说:“我尽了国测一大队队员的本分”。

本分！很简单的一个词。

对国测一大队的队员来说，这个词,意味着当你面对极限、面对艰辛、面对困难、面对危险的时候,绝不退缩。这个词,还意味着必须要习惯在天地之间的任何地方工作，不管这个地方是冰雪荒山,还是黄沙大漠,是高山峡谷,还是海岛礁盘,是水乡泽国,还是戈壁草原……

在地温高达 60 多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,大地如蒸笼,一天喝 20 斤的水,队员们依然感觉焦渴难忍,头晕眼花;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区,最冷时温度达零下 45 摄氏度,队员们操作仪器,为了保持观测精度,却不能戴手套；

在阿尔金山里,黑蚊子云雾般地围着人和牲口飞。一匹白马转瞬间叮满蚊子,成了黑马,黑马在地上打个滚,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马染成红马；

在中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艾丁湖,海拔仅 154 米,温高风大,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大风刮跑,追了近 100 公里才找到;

在远离祖国 2 万公里的南极冰原,为了填补我国南极观测的空白,队员们为了几个数字,在大雪中坚守 4 天 4 夜；

在可西里，泥泞的沼泽充满危险，一辆车一天陷了 30 多次，挖了 30 多次，一整天只走了 3 公里；

在藏北无人区,因为缺氧,队员头疼欲裂。为了止疼,队员把头卡在钢架床的床头钢管之间,这样卡住,外面一疼,里面的疼就不觉得了……

有一年，一组 8 名队员在塔克拉玛干南缘作业。每天观测时,毒蚊子成群结队如轰炸机般在队员头顶盘旋。一次,累极的队员们在红柳滩夜宿,刚一着地便睡熟了,等到天亮爬起,每个队员浑身上下被蚊子叮满了红包,痒得钻心。一个队员拿干树皮往身上一擦,鲜血直流。等到完成任务从戈壁深处走出来时,大家的脸庞都小了一圈。平均每个人瘦了 11 斤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曹妃甸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韩建民告诉记者，随着 25 万吨级矿石码头、30 万吨级原油码头、年吞吐量 5000 万吨的煤炭码头及通用码头的建设和依次投入运营,曹妃甸港口已经形成的吞吐能力达 1.2 亿吨,走过了许多国内大港 100 年才走完的路程,其发展速度堪称世界港口建设史上的奇迹。

另据透露，曹妃甸 25 万吨级矿石码头两个新泊位、5000 万吨煤炭码头二期工程将很快动工兴建。到明年,曹妃甸港口的年吞吐能力即可突破 2 亿吨。曹妃甸成为一个世界级大港的日子,已屈指可数。

投资热、建设热，一浪高过一浪

几年来,记者已多次到过曹妃甸。在短短几年里,曹妃甸从一个“上无一片瓦、下无一棵树”的小沙洲,已成为一个拥有 140 平方公里陆域、厂房林立、办公生活设施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园区。过去大风一起,这里便沙尘满天,如今曹妃甸已实施绿化美化面积 370 公顷,道路两侧绿意盎然。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起来的曹妃岛宾馆，则是掩映在绿树中的一片小木

有人说，那一段测绘成果是用 88 斤新鲜的血肉换来的。“我们干的工作,是天和地之间的大活”,一位老队员说:“再说细点,就是四句话:坚守在荒天野地,生活是幕天席地,工作中战天斗地,为祖国经天纬地。”

其实还应该补上一句,他们的坚守感天动地。

生与死 哭和笑“父亲,我没有见过你,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,今天我来看你,给你送点水。”——吴永安

在国测一大队队史室的墙壁上,我看到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。这是从 1954 年到 1989 年，牺牲在野外岗位上的测绘队员,有 46 人。

牺牲者中,有的渴死、冻死、病死,有的坠下悬崖,有的摔入雪窟,有的遭遇雷击……

他们大多英年早逝,有的死得很壮烈,有的死得很平淡,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!他们的遗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远的测区,其中大多数连墓碑也没能留下。

在北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一楼大厅里,放着一台老式的测绘仪器,它有个名字,叫“宋泽盛仪器”。这台仪器背后,有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。

在北疆阿尔泰山脉深处,有一座山名叫尖山,陡峭险峻,怪石嶙峋。1959 年 7 月一个黄昏，国测一大队作业组长宋泽盛,带领几名队员,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,终于完成了尖山山顶的测绘任务。

崎岖山路宛如一条羊肠,紧缠在山腰上,一边是峭壁,一边是悬崖。太疲惫了,一名队员在丁撒撤途中,一不小心,背上沉重的经纬仪撞上了峭壁，立刻重心不稳,连人带仪器向悬崖边滑去。

走在后面的宋泽盛一个箭步冲上去,用双手托住下滑的队友,使出全身力气将队友往上推。队友和仪器安全了。宋泽盛的身体却失去平衡,他脚下的碎石不断地滑落。当队友们伸出援手时,宋泽盛的指尖从他们手前滑过,大家眼睁睁看着他坠落到几十米深的山崖下。

宋泽盛牺牲后,大家把这台仪器以他的名字命名,争相使用,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敬仰。

牺牲者当中,有一个人是被土匪杀害的,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揪心不已。

1963 年 7 月,在甘肃南部的腊子口大山中,钟亮其遭五六个土匪围堵绑架。土匪逼问测量组驻地,严刑逼供中,钟亮其被打破,身中数刀。为了小组安全,他宁死不屈,只字不吐,惨遭土匪杀害。一个星期后,队员们在白龙江边的沙滩上，发现了钟亮其遍体鳞伤的尸体。几个月后,这些土匪被抓获,人们才知道钟亮其牺牲的经过。

钟亮其是烈士的后代，家中的独生子,牺牲时还不到 30 岁。

国测一大队年过 70 的老一代的测绘队员，在接受采访时，都会提到一个名字——吴昭璞。说起他,没有人不掉泪。

1960 年 4 月底,31 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。

红褐色的沙地一望无际，烈日当空，一具骆驼的庞大白骨分外扎眼。天上,没有一片云;地上,没有一滴水。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,地上的沙石更热得烫脚。

一天早晨,意外发生了: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。桶空了,断水了,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在 200 公里外。

茫茫戈壁,这意味着什么,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。沉默中,吴昭璞做出决定,他把仅有的水囊递给一位年轻队员:“必须马上撤离,你们两人一组,认好路线轻装外撤,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,等着你们带水回来。”

“这样不行,你太危险……”有队友想争辩,被吴昭璞制止。“大家早一分钟走出戈壁,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。”

队友们依依不舍地走了。他们竭尽全力,3 天后回来了。

屋。在曹妃甸的东北边,作为工业区生活依托的国际生态城也已开工建设。

7 月底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。但是曹妃甸 10 万建设者们并没因高温酷暑放慢一点建设的步伐。整个曹妃甸就像一个看不到边的大工地。重型卡车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强夯机的轰鸣声汇成一部宏大的交响乐,浩瀚的海面上,作业船来往穿梭,星罗棋布。

“保增长、扩内需、振兴十大产业、国家的宏观政策,为曹妃甸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。”刘建立说,去年下半年,受大环境的影响,曹妃甸一度出现开发建设资金紧张的状况。为有效应对经济形势变化,曹妃甸工业区积极创新投融资体制和管理机制,将招商引资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推进。工业区大胆探索创新了“职能部门+园区指挥部+公司”新型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,分别成立了钢铁(电力)、石化、装备制造、港口建设、高新技术等五大产业园区指挥部,由各副主任牵头,从引进到组织实施,一条龙服务到底,基本扭转了去年下半年资金供应紧缺的局面,今年平均每天完成的投资量是去年同期的一倍。今年曹妃甸续建、新开工工业、港口物流、基础设施三类项目 131 项,总投

综 合 — 大地雄心

等他们找到吴昭璞时,被眼前悲壮的情景震撼——

帐篷里所有的牙膏吃光了,所有的墨水喝干了。吴昭璞口含黄沙,十指深深插进沙土。身高 1 米 7 的吴昭璞,已干缩到不足 4 尺;原本英俊帅气的小伙儿,武汉测绘学院的高材生,如今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。

他的手表,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。他的身后，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;他沾满汗渍的衣服,严严实实地盖在测绘仪器上。

他最后告别为之奋斗的测绘事业时,是多么恋恋不舍。

这一天正好是 5 月 1 日,是劳动者的节日。

队友们心如刀绞。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发现了 3 斤红毛线。

这是几周前,他在鄯善县城买的。当时就要进戈壁了,遇到集市,吴昭璞想给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妻子和还没出生的孩子买点东西。看到这个红毛线,他很喜欢,就买了价钱。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,“远看像讨饭的,近看像逃难的”,就不客气地回了一句:“你买不起就别问。”

吴昭璞没有动力,他只是回了一句,“你有多少毛线,我全买了。”

带着 3 斤红毛线，吴昭璞进了戈壁,再也没有出来。后来,这 3 斤红毛线,被队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。

多年以后，吴昭璞的遗腹子吴永安长大了,他来到位于西安的国测一大队。当年吴昭璞的队友，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鲜红的毛衣,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们都认识,这件毛衣上的毛线就是当年那 3 斤红毛线。这毛线的颜色,他们刻骨铭心。

吴永安后来也成了一名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。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务,就申请去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壁。

在戈壁外的荒滩上,永安没有找到父亲的墓。由于道路变迁,当时又没能立碑,当年埋葬父亲遗骨的地方已经成为乱坟岗。只知道是这一片,不知道是哪个。

永安买了两个几十公斤的大塑料桶,满满装上水。他抱着水,搬到了乱坟岗上。“父亲,我没有见过你,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,今天我来看你,给你送点水。”

在 46 名牺牲者当中,宋泽盛、钟亮其、吴昭璞还是“幸运”的,因为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传诵。还有十几名队员,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。只知道他曾经牺牲,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。

社会在发展,测绘也在进步。条件在改善,装备在更新,观念在提升,自 1989 年至今的 20 年里，国测一大队极少发生队员牺牲的情况。

但是,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,而且永远也无法改变。

那些高山、荒原、大漠、戈壁……恶劣的自然环境，一代代的测绘队员,都无法逃避,必须去面对。

还是在吴昭璞牺牲的南湖戈壁,时间是 30 多年后，中队长张全德带领着张朝晖等 10 名年轻的测绘队员,在这里工作了 42 天。

一杯早上倒的开水,晚上回来还是热的;带去的巧克力,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酱;连木箱也受不了这种干燥炎热,不断地开裂,铺床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断。

刚出锅的馒头,很快就能干透,一口咬下去,把牙齿能咯出血,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按一下,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。只好用水冲着一吃,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。

整整 42 天,队员们都成了黄风怪。所有抬杠的话都说完了，笑话也说完了,经常你看着我,我看看你,发呆。

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，活着的东西都让人尊敬。有一次,大风刮进来一只蜥蜴,可能太热了,蜥蜴总是三条腿着地,还不停换腿。队员刘建是转业军人,他看着蜥蜴换腿,竟感觉像是在给他敬礼。他站直了,“啪”,也对着蜥蜴,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就连逃难这种小昆虫,队员们也觉得是个伴,不忍心伤害。

就在作业即将结束前 2 天,张朝晖病

倒了。因为蔬菜断了很久,他出现了严重的缺钾症状,肌肉麻痹,走路总摔跤,碗端不起来,后来连说话都困难。

队友们决定连夜把他送出去。开了一夜的车,中队长张全德抱着张朝晖,怕他昏迷太久,就高声吼起秦腔。

张朝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段秦腔声,大嗓门,不着调,但是每次想起来,心里暖和。

长时间跟野外队员在一起,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秘密：每个队员都会抽烟,因为孤独和寂寞；很多人也要用卫生巾,因为长期在高原,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痔疮……

对于在野外的测绘队员来说,什么是幸福？

每天早上起来，能用热水洗把脸,吃个热饭;出测回来,能及时喝上一杯热水,这就是幸福。

今年刚加入一大队的王涛第一次来西藏,他把感受写成一首诗，第一句是:“以前总对生活要求太高，现在只要给我四面墙,房顶不要都行。”

长时间在野外，没有发钱的机会,更没有花钱的机会。每当发工资的时候,测绘队员都会感到幸福，因为半年到 10 个月的工资会一次性给他们。

当然,最大的幸福还是能顺利完成测量任务,辛苦没有白搭,汗水没有白流,心血没有白费。

虽然很苦,但是测量队员们早已习惯了苦中作乐,苦中找乐,苦中品乐。

队员王文胜的感受很有代表性:“我们工作虽然有点苦,但是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美风景，这些经历谁能有。”

同样重要的是，跑野外锻炼人的性格,让人肩膀更宽,心胸更开阔。

“在野外战天斗地,未必不是幸福。”

先与后 变和守 凡是苦活、累活、重活、危险的话,干部先,队员后,老队员先,新队员后。——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

不了解国测一大队的人,总是好奇一件事:为什么活再苦、再累、再重、再危险、再艰难,这支队伍都拿得下来,而且出色地完成?

跟随他们在青藏高原走了 100 多天,记者发现了这个“秘密”——这支队伍有一种独特的、代代相传的团队气质。

这种团队气质始于干部,又影响到每个队员,逐渐演变成国测一大队的内在气场和工作哲学。内在气场的核心也是干部,工作哲学则体现在先与后、变和守两对关系上。

凡是苦活、累活、重活、危险的话,干部先,队员后,老队员先,新队员后,这是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。军规虽然从来不成文,但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进每个人的血液。必须遵守,没有例外。

干部上了,队员们不自觉地,会跟着干部上。当队员们也逐渐变成干部,就会有新的队员,也跟着他上。

张朝晖至今还记得 1986 年黄河支流上的一个情景:小组在甘肃刘家峡水库作业,要越过黄河一条较大的支流,才能到测量点上。组长是 40 多岁的赵景昂,他二话不说,把衣服脱下来,跳进河里,要游泳过去。可水很急,他一下被冲走了十几米。爬回岸上后,他让大家把皮带接起来。他拉着皮带先游过了河，然后从附近老乡家借了两个梯子回来。他把梯子搭起来,跳进水中,举起梯子,让大家从梯子上爬过了河。

这是真正的人梯,张朝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画面。

王文胜也忘不了第一次进藏作业的情景。中队在珠峰大本营开会,分配测量任务。最难的一个测量点叫三七点,海拔超过 6000 米,要穿越绒布冰川,还要在点上坚守好几天,非常艰苦和危险。

会开得很短,中队长刘志良也不善言辞。他说:“谁是党员,哦,王忠良是,那好,

你和我,咱们俩上三七点。”“以前以为这是电影里的镜头,但是它就在我身边,很简单,很平常”,王文胜说:“一大队的人都朴实，没什么大话,但是真干活,也真出活。”

在国测一大队，不管你什么职务,什么学历,只要有活来了,所有人都一起上,没有人例外。

2005 年珠峰复测，一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冲在一线。大队长岳建利担任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,在珠峰大本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,队员们轮流乘车去百公里以外的定日县洗澡、打电话,岳建利却一直坚守岗位,寸步未离。

2005 年 5 月 13 日，记者跟踪采访珠峰复测行动时,在从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撤往海拔 5200 米的大本营的途中，遇到了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陈永军。

他告诉记者，在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，登顶测量要用的觇标上的冰锥断了,情况紧急。预计两三天后队员就要冲顶了,马上要用觇标,陈永军决定自己连夜把冰锥送上去。

在深夜里攀登到海拔 6500 米,相当危险。其实,陈永军可以让更年轻、体力更好的队员承担这个任务,但是他宁可自己受苦。“我是副队长,这是我的本分。”

陈永军靠着顽强的毅力,9 个多小时徒步 16 公里,深夜 12 点,把冰锥及时送到了前进营地,保障了珠峰冲顶顺利实施。

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时代,在国测一大队的工作哲学中,变与守的平衡始终是队领导最关注的。

一方面,国测一大队坚持变;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,更新科技装备,改革管理机制,同时大力提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。

比如这几年的西部测图工程,国家测绘局要求零伤亡,每一部车的位置北京指挥部都知道,必要时可以弃车,保人是第一位的。

另一方面,国测一大队坚持守:团队气质不能变,协作精神不能变,严谨作风不能变……

“这就好比水准测量”,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刘健说,1975 年他刚进队,当时一个水准小组一年只能测 200 公里;现在科技水平提高了,一年能测 1000 公里。

但是有两点，一是水准测量方法没变,依然要靠步行完成,依然是仪器前后每距 35 米架一个标尺，一个点测完再步行 70 米到下一个点;二是全国 12 万公里长的基本水准线没变,不论科技水平如何提高,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,还得靠队员徒步,而且必须是往返。

“既然方法没变,路没变,那很多东西也不能变。”

大与小 国和家 “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,绿叶发的时候出征,树叶黄的时候归来。”——岳建利

你问国测一大队的队员，你爱测绘吗?十有八九都会用陕西方言告诉你:“有啥爱不爱的,干活就是咧！”

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，不会说大话,更不会唱高调。但是国家任务来了,他们却没二话,不讲条件,不讲困难,不讲代价,拿着包就出发。

测绘队员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说:“国测一大队的人怎么都跟中了魔一样,国家一有任务,老婆孩子就不管了,说走就走。”

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,分得清什么大、什么小,什么重,什么轻,谁也不说,谁都知道。

一大队的人平时都很平凡,但是一有国家任务,特别是带有艰苦性、危险性的工作时,没有人会退缩。如果换做某些地方的队伍,可能会因为太难太苦,钱又不多,选择不干。但是,在一大队的字典里,没有退缩这个词,从上到下,都是好汉。

面投产，将形成 970 万吨的钢生产能力；与其配套建设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——日投产 5 万吨海水淡化项目一期工程也已投入使用。

7 月 2 日，华润曹妃甸电厂 60 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。

投资 6 亿元建成、年产 80 万吨钢构件的中冶京唐装备制造公司,目前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钢构件制造企业。

华电临港重型装备制造基地、中石油渤海湾生产支持基地、哈电风力发电装备、开诚航证自动化设备、恒基伟业新能源、中视中科激光显示基地、豪华游艇、电动汽车、锂电池等近 20 个项目陆续动工。

“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投资者,但我们不是什么都要。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、循环经济示范区,是建设天蓝、海碧、绿树成荫的生态城市。”刘建立向记者介绍,即便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，曹妃甸仍然坚持着既定原则:循环经济第一,生态模式第一,产业准入门槛不降低。

记者看到,在曹妃甸工业区的开工项目表上，所有项目都围绕着港口物流、钢铁、石化、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展开,不

中队长尚小琪，孩子刚出生第一年,他外业工作 10 个月;孩子 2 岁这一年,他外业工作 8 个月;孩子 3 岁这一年,他外业工作 7 个半月……妻子摔伤骨折,他也没回来,受伤的妻子还得自己照顾年幼的孩子。

“我也想回去,但是不能”,尚小琪说,野外作业是一个集体工作,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。

有队员出外业时曾遇到父亲去世,这样的事,如果提出来,肯定让他走。但是他没有提,因为他知道,一个萝卜一个坑,一个人走了,小组就会停摆,任务就能完不成了。“在家庭和工作之间,工作第一,任何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,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后,再想办法补救。”这是国测一大队第二个不成文的军规。

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军规，大家都要遵守。因为每个队员深知:测绘工作的性质决定,外业有时间要求,有费用限制,不能耽搁,要完成只能牺牲家庭,没有第二个选择。“我也想有第二个选择,但是没有。”这是国测一大队队员经常给人家说的一句话。

当国家和家出现矛盾的时候,唯一的选择就是:国家大小。

“有时真觉得苦,有时也觉得愧对家人”,一名队员说,“但是卫星升空、神舟飞天、新建工厂和新修铁路都离不开我们,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快会有新的建设,人们使用的地图上有着我们的心血，想到这些,我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。这工作,国家需要,人民需要,我们干这个工作,不丢人,有意思。”

的确,测绘者的身影无处不在,但测绘者的身影又都隐在暗处。“走在龙头,位在龙尾”,就是对测绘工作的形象比喻。很多耳熟能详的工程其实都离不开国测一大队的支持:青藏公路,西气东输,磁悬浮,天津港,珠海澳大桥,杭州湾大桥……但是谈起起这些工程,却很少有人提起国测一大队。

“还有人把测绘队员称为‘幸福使者’”,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,因为测绘队员一来，这个地方就要搞建设了;有了建设，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会变好,还不幸福吗?但测绘的性质决定,测绘队员注定是一个给人幸福的先行者,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尝者。

测绘队员在野外很寂寞。

寂寞确实很痛苦,但寂寞更痛苦的是对亲人的思念。出外业时,测绘队员的电脑背景,几乎毫无例外,都是家人的照片。

几乎所有队员,都爱听这首歌,也怕听这首歌——《故乡的云》。

“归来吧,归来吧,浪迹天涯的游子;归来吧,归来吧,别再四处漂泊;我曾经豪情万丈,归来却空空的行囊;那故乡的风,和故乡的云,为我抚平创伤。”

听这首歌,会想家,想家里的人;但听着听着,“歌词就像刀子,扎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”

每个测绘队员,几乎都毫无例外,心里有同一种创伤——对家庭的感谢和歉疚。

“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,绿叶发的时候出征,树叶黄的时候归来。”岳建利说,队员们一般春天离开家,在每年腊月下旬才能赶回来。

“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,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”,家属史玉萍说,但是每次丈夫回来,都忙着干这干那,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接送孩子……一个大男人,几乎什么家务都做,那种殷勤和关怀,又让自己感动。

其实，国测一大队的队员都是如此,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。

作为一个测绘队员,他们的时间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两半。一小半给了自己的小家,一大半给了祖国这个大家。他们对此没有选择，有的只是热爱。

每年开春，他们都会经历同样一场煎熬,离开温暖的小家,投身到祖国的大家中。

当他们在荒原旷野和荒山野岭上默默竖起测量杆的时候,也同时树起了自己的精神标杆和人生标杆。

有的英雄生在枪林弹雨中造就,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,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。